

踏著台灣文學史的軌跡

《文訊》是一份「拿文學當文學看待」的刊物，串連起二百期的內容，可將台灣近二十年文學歷史時空經緯現象，浮現出清楚的輪廓。

與《文訊》密切而愉快的往來

我認識《文訊》的時間相當早，大約一九八四年春，《文訊》剛創刊不久，總編輯孫起明就開始與我有些接觸，邀我寫稿、座談或文友聚會。接著，一九八四年冬，李瑞騰繼孫起明之後擔任總編輯。次年冬，蔣震接任發行人兼社長。《文訊》與我之間的來往，一直頗為密切而愉快。

瑞騰本來就是好朋友。起明和蔣震以前不認識，但接觸之後，覺得他們都是性情中人，坦率而有趣，完全沒有黨務人員的樣子。到現在，他們都還是經常讓我想念的朋友。坦白說，剛開始，對於《文訊》這樣的刊物，我相當謹慎地保持一段距離。經過些時日後，先是被起明的真性情所感動，繼而瑞騰接掌編務，蔣震又是那般令人愉快的老大哥；距離很快就拉近了。接著，從《文訊》每期的內容，證實了這是一份「拿文學當文學看待」的刊物，而不是政黨的文宣工具；和它來往，用不著擔心被「染色」或被當成「麥克風」。從《文訊》這樣一份刊物，也讓許多文壇人士對國民黨的「文化智慧」有了新的評量。

令人稱讚的「專題性」編輯方針

《文訊》走上「專題性」的編輯型態，始於一九八四年二月，孫起明總編輯任內，七、八兩期合刊的「抗戰文學口述歷史專輯」。這個專輯很明確的是一個「現代文學史」的議題。而且參與的人兼括了大陸遷台和本地的作家、學者，如王平陵、陳紀澄、蘇雲林、張秀亞、謝冰瑩、紀弦、王夢鷗、胡秋原、陳火泉、楊逵、楊雲萍、龍瑛宗等；所談的內容，也兼及大陸、台灣兩地抗戰時期的文學歷史。顯然，編者找到了一個可以接通兩岸現代文學史的時區及議題。從此，確立了《文訊》的編輯方針——踏著現、當代台灣文學史的軌跡前進！

我不知道，這個編輯方針當初是怎麼被構想出來的？現在回頭去看，不能不稱讚這樣的眼光。不過，方針必須有人去創設，也必須有人持續地、貫徹地去實踐出來，才能累積甚至建構這個刊物自身的歷史。《文訊》無疑的是一個已完整地建構了自身歷史的刊物。其中的關鍵人物，除了當初編輯方針的創設者之外，瑞騰總理編務八年，始終貫徹這一方針。一九九二年間，封德屏繼任總編輯至今，仍然掌穩船舵，航向台灣文學歷史的未來。他們更是建構《文訊》自身歷史的靈魂人物。台灣的文學刊物，如《文訊》這樣「一以貫之」者，實在罕見。

二十年來台灣文學最完整的資料庫

《文訊》自身的歷史與台灣這二十年來的文學歷史是二條同步在前進的軌道。假如，我們將它從一九八三年七月的創刊號開始，依序排列到二〇〇期，並把每一期的「專題」，以及其他幾個重要的專欄，例如「書的世界」、「藝文史記」、「人物春秋」等，加以串連起來，那麼台灣這二十年文學歷史時空經緯現象便浮現出



「人物春秋」是《文訊》對作家表達尊崇與敬意的設計。(王雲攝)

相當清楚的輪廓了。於人，它涵括了多數老、中、青三代的重要作家；於作品，它涵括了每年各種文類的出版圖書；於事，它涵括了台灣各地區以及許多文藝團體的活動；於觀念、理論，它涵括了不少當代重要的文藝議題與思潮。我們應當可以斷言，這二百期的《文訊》，是研究二十年來台灣文學發展歷史最完整的資料庫。

超越、客觀與包容

起先，我有些疑慮《文訊》會讓「文學」變成「政治」的工具。其實，從整部古典的「中國文學史」去看，甚至延續到現、當代的中國或台灣文學史去看，「文學」之與「政治」，從沒有斷絕過關係，並且關係非常複雜：差別的只是或隱或現於其間的「人」，各自站在什麼立場、持著什麼經驗、抱著什麼意識去看待二者的關係。台灣近幾十年來的文學性雜誌（或廣義的文化綜合性雜誌），主其事者很少不或明或暗地抱持著某種特定的政治立場或意識型態。超越、客觀與包容，並非那麼容易做到。

我想，《文訊》正因為它從誕生便已烙上政黨的印記，幾任的總編輯反而戒慎恐懼，自覺地想去超越特定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，讓這份刊物能展現最大的包容性。只要特定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這塊「神主牌」往文學殿堂的中央一擺，包容性立刻消失，「政治」立刻對「文學」發出最強大的支配力，而「文學歷史」的建構也跟著淪為不同政治群體間「解釋權」的爭奪戰了。

雖然，文學「史料」的集存，仍不免在選擇過程中，自覺或不自覺地涉入主觀的意向；但是，相較於無可商榷的特定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，儘量抱持超越的態度，客觀地以集存文學「史料」為編輯方針，應該是減低政治對文學的支配力，而相對客觀地呈現文學歷史的最可行的一條路。長達十九年，總數二百期的《文訊》，三任總編輯一貫地堅持集存「文學史料」的信念，因而能將台灣近二十年來的文學發展，做出比較客觀而多面的記錄，其「用心」讓人讚佩。